

【以史为鉴】

□智效民

民国年间,有一个主管资源分布和重工业生产的垄断部门,名叫资源委员会,简称“资委会”。这个国字号单位与如今的“国资委”在名称和功能上极为相似。

“九一八事变”以后,蒋介石为了应付内忧外患的新局面,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。该会隶属于参谋本部,由蒋介石亲自任委员长,翁文灏任秘书长,钱昌照任副秘书长,负责处理日常事务。

据钱昌照说,这个主意是他提出的,他认为“国防设计应该是广义的,其中包括军事、国际关系、教育文化、财政经济、原料及制造、交通运输、土地及粮食和专门人才的调查等部门”。由此可见,这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垄断机构。

1934年,国防设计委员会改名为资源委员会,从参谋本部划归军事委员会领导,成为一个主管重工业建设的部门。

抗日战争开始后,国民政府经过重大改组,将资源委员会划归经济部,翁文灏担任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,钱昌照任资委会副主任委员。

对于钱昌照这个人,沈怡和张慰慈都有评论。沈是钱的妻兄,他早年在德国专攻水利,回国后进入政界,担任过交通部次长、大连市市长、南京特别市市长等职。晚年他在谈到自己的这位妹夫时,讲了四点长处:一是聪明过人,二是善于学习,三是知人善任,四是颇有魄力。与此同时,他还讲了钱的若干短处,其中最要命的是少年得志、目中无人。另外,沈对翁文灏的印象是“学问、道德、操守,令人尊重,只是他有一个缺点,即气度狭窄,疑心病很重”。

张慰慈既是胡适的好友,又是著

民国有个“国资委”

在这种情况下,资源委员会所属各单位又都是“没办法,或非赔钱不可的”,因此,他所谓国营,不过“是‘国赔’而已”。

名的政治学家。抗日战争开始后,他在资源委员会担任购置室主任,因为不满钱昌照的作风而想辞职。所以他在1938年底写信对胡适说:在所谓抗战时期,决不是我们讲建设的时候,因为所谓厂矿决非立时立刻可以办得起来,等到办了一半停止,不是前功尽弃、白费金钱?但乙藜(钱昌照字)先生一类人物只晓得海阔天空,乱吹乱唱,今天办这样,明天办那样,至于怎样去办,办了以后又有怎样影响,他们毫不计及。到了今年秋天,湖南湖北江西等处的厂矿就拆的拆,搬的搬,毁的毁,不晓得白费了多少金钱。可是经过了这样的教训以后,他们还是不能觉悟,照样的要买这样,买那样,还是大刀阔斧的去干。但我却不愿意把有用的金钱由我的手里白花出去,所以借了另外一个题目,打了几个电报向资源委员会辞职。

他还说:“詠霓(翁文灏字)是一个极好的好人,但胆子太小,气量不大,很不容易有作为。我想他对于资源委员会的事务,很不满意,不过他没有办法,只得听之而已。”

抗日战争胜利后,1945年5月,翁文灏出任行政院副院长、国民政府委员。1947年4月,他又辞去行政院副院长,再度担任资源委员会领导职务。他这次返回资源委员会,大概与傅斯年炮轰宋子文以及钱昌照的辞职有关。

1947年1月,著名学者傅斯年在《世纪评论》和《观察》连续发表文章,炮轰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。其中有这样一段话:

资源委员会号称办理一切重工

业。这样发达的国家资本,我们应该几乎要成社会主义国家了,然而内容大大不然。糟得很多,效能二字谈不到的更多。譬如两路局、资源委员会等,你不能说他贪污。但无能和不合理的现象更普遍。推其原因,各种恶势力支配着(自然不以孔宋为限),豪门把持着,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、荒唐着、僵冻着、腐败着。恶势力支配,便费滋养恶势力,豪门把持,便是发展豪门,循环不已,照道理说,国家必糟。

傅斯年还说:宋子文“有时仿佛是有政策的”,但“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”,因此他所谓国营,不过是“宋营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资源委员会所属各单位又都是“没办法,或非赔钱不可的”,因此,他所谓国营,不过“是‘国赔’而已”。

对于翁文灏和钱昌照,胡适在1954年有过评论。他说:“中国士大夫阶级中,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;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,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。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,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,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。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,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,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,在过去二十年之中,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,对于私有企业(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包办的私有企业)蚕食鲸吞,或则被其窒息而死。他们两位(翁文灏、钱昌照)终于靠扰,反美而羡慕苏俄,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联的。”

(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,著有《长袍与牢骚》等书)

中国书画史上的大人物,要么写得好,如王羲之、张旭;要么画得好,如吴道子、黄公望;也有写得好又画得好的,如赵孟頫;但有一个人例外,他工书善画,但还不足以在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,却因为被画了一回,就成了中国艺术史上的著名人物。这个人就是五代时期南唐重臣韩熙载。

韩熙载的一场宴会因被“现场直播”而名传后世。中国人讲究吃,但有时候吃饭也很危险。历史上最危险的饭局是2000多年前的鸿门宴。鸿门宴后1000多年的这场宴会,更加扣人心弦,只是与会者并不自知,或者,宴会的主人就是故意在演戏。

那天晚上,韩熙载请客——他经常请客,时时饮宴,夜夜笙歌,通宵达旦。韩熙载才华横溢,富有政治才能,这时却以蓄伎纵酒、沉溺声色闻名。皇帝想重用他,让他当宰相,可他出身北方士族,又名声不堪,这让皇帝很纠结,也对他心存戒备。正好这晚上他请客,皇帝就派了两个特务去刺探,看他都请了谁,究竟要干什么。这两

【宣纸上的故事】

韩熙载夜宴

□李北山



个特务也很特殊,一个叫顾闳中,一个叫周文矩,都是画家。他们潜入韩宅,冒着被发现的危险,看一群人唱歌跳舞、调笑放纵。他们当中有当年的新科状元郎粲,有一些无足轻重的官员,还有当时一些走红的歌姬——说不定他们也熟。夜宴气氛异常热烈,大家觥筹交错,让人感觉没完没了。两个画家一直看了大半夜,直到曲终人散。他们回来向皇帝汇报。

顾闳中和周文矩是不是好特务不敢说,至少没被人发现,但肯定是好画家。他们根据所观,各自绘制了一幅《韩熙载夜宴图》,送给皇帝看。皇帝看了画以后,对韩熙载的戒心消除了,只能摇头苦笑,对韩熙载说你让我拿你怎么办呢,这话里的意思大概是说你不争气。这皇帝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南唐后主李煜,词写得好,最后把性命给写没了。时值五代十国时期,战乱频仍,南唐地处江南,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,皇帝做得提心吊胆。画里的韩熙载也不高兴,显得忧心忡忡,大概就是这怏怏不乐的神情让皇帝释然了,设想要是自己不高兴,看到臣属却兴高采烈,肯定心里更不痛快。一般认为,韩熙载是真不高兴,他纵情声色是不想称孤,他认为,“中原王朝一直对江南虎视眈眈,一旦真命天子出现,我们连弃甲的时间都没有了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如何能够接受拜相,成为千古之笑谈?”但这也同时宣告他的政治抱负和理想的完全破灭。

随理想幻灭而来的,就是以声色自娱。这是韩熙载的政治障眼法,也是其本性使然。陆游就在《南唐书·韩熙载传》中评价他“年少,放荡不守名检”。韩熙载才华横溢,文章写得好,书法写得也好,当时文名远播,江南贵族、士人、僧道带着金帛求他撰写碑碣的人不绝于道,甚至有以千金求其一文者,加上皇帝的赏赐,韩熙载成为南唐朝臣中的巨富,是真土豪。所以他有条件蓄养乐伎,请客吃饭。每当请客,他就先让女仆与客人见面,或调戏,或敲击,或加以争夺靴笏,无不曲尽,然后韩熙载才缓步而出。他还喜欢当着众歌伎的面,挨个摸客人的胯下,一论短长。他能赚钱,更能花钱,每月发了薪水,就赏于诸伎,最后竟致家财耗尽,经常搞到一家人不能度日的地步。每当家里揭不开锅了,他就换上破衣烂衫,装成盲叟模样,手持独弦琴,让他的学生舒雅执板,敲打着,逐房向诸伎乞讨。有时碰到伎妾与诸生私会,韩熙载很兴趣地在门口站住,还会笑着说不好意思打扰了你们的好兴致。

韩熙载终于没看到亡国,这应该是他乐意接受的。他69岁去世时,是宋太祖开宝三年(970),他死后五年,后唐亡国,后主李煜被俘,在大宋的都城汴州,感怀故国,写下千古传唱的《虞美人》,被宋太宗毒死了。

(本文作者为出版人、艺术学者)

【文坛旧闻】

□散木

老北大和老清华曾有一位出身革命的教授和导师,他就是黄节(晦闻)先生。

黄节以诗闻世,他有“南国诗人”、“诗人厅长”(其曾任广东教育厅长)之称,而他的一部《兼葭楼诗》更是脍炙人口,从诗学或诗艺上说,他对于诗歌的研究曾被称为是空前绝后的,其诗宗法“江西诗派”,因此与黄庭坚并称,可谓超然绝群。此外,说到晚清以及民初,几乎所有的文化潮流和文学新潮都不能绕开黄节,比如借“复古”倒清的“国学保存会”、提倡“种族意识”的《国粹学报》、集诗歌与革命于一体的“南社”,等等。当年他还有一部《黄史》,其实就是一部记叙汉人的历史,那时他和章太炎、邓实等都是主张用种族、历史为精神资源来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的。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:黄节,就是讲求“名节”(他原名“纯熙”),因向往宋明人物的气节,遂易名为“节”),所以他后来会痛心疾首于刘师培的“下水”,又猛烈抨击“筹安会”的人物。在那个时代,黄节是风起云涌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弄潮儿之一。

“革命”成功后,黄节转入了仕途,成为京汉铁路的秘书长。可以设想:如果他在在这个位置上长此以往,笃定会是一个“大款”式人物,可是黄节天性不耐俗事,也不习惯于政治生活,不久他就去了北大,以教书为业。再后来孙中山发动倒袁运动,黄节亦南下追随,为广东大元帅府的秘书。此后他又返回北大的教职,也正如当时黄节的同人周作人在晚年回忆所说:“北伐成功以来,所谓吃‘五四’饭的都飞黄腾达起来,做上了新官僚,黄节是长辈却那样的退隐下来,岂不是落伍之尤,但是他自有他的见地。”周作人还回忆说:“他平常愤世嫉俗,觉得现时很像明季,为人写字常钤一印章,文曰‘如此江山’。”于是,这也就注定了黄节此后的命运:终年吃粉笔灰而已,但他心情淡定,萧索,他曾发愿注释顾炎武的诗集,然而天嫉才人,黄节长年疾病缠身,乃至终于不起。

临终前黄节有一佚事:他自称在病中发现了个哲理,即人在死去时灵魂会脱离肉体离去,那是在灵魂升天之

诗人黄节

正如他的名字所昭示:黄节,就是讲求“名节”,所以他后来会痛心疾首于刘师培的“下水”,又猛烈抨击“筹安会”的人物。



黄节

前,灵魂是聚集在大脑中的,如果灵魂由大脑中离去,人在临死时会异常痛苦,如果它是下降到肢体中离去的,则所受痛苦要少得多。也许这是黄节的一种“极限感受”吧,但不知黄节的灵魂最后走的是什么途径(大脑抑或肢体),不过当时人们所感慨的,却是他身后的异常萧条。黄节去世后,周作人挽云:

如此江山,渐将日暮途穷,不堪追忆索常侍;

及今归去,等是风流云散,差幸免作顾亭林。

这副联语写得真是不错,不独嵌入了“今典”,而且带出了两个历史人物:西晋的索靖和清初的顾炎武,细思令人不胜感慨。

黄节好友马叙伦也曾有诗记之,那是黄节死后的一年,马叙伦诗曰:

与子交亲到暮年,相期不必画凌烟。偶然各为苍生出,还闭柴门续旧篇。

新诗早入江湖集(即《同光集》),旧德仍推复社魁(黄节曾与邓实、马叙伦等发起“国学保存会”,出刊《国粹学报》,又加入“南社”等)。大学廿年成皓首(其在北大共二十年),一蹶桃李半君栽。

春明馆外坐诗人(此前春秋之际,黄节时于夕阳时在中山公园“春明馆”啜茗),苦对斜阳作主宾。莫谓置身人海里,眼前红绿不知春。

赋罢“重关”忧已深(黄节曾于“九一八”后作《重关篇》,感愤东北失地),伤心更注顾亭林(黄节在北大教授顾炎武诗,并许之为“近代第一”,又为其诗作注释)。亡亡小雅吾知惧,空费回天字字金。

岭外诗人说二黄(黄遵宪、黄节),吾交叔度信汪洋。去年今日惊星陨,一卷“兼葭”倍可伤(黄节有《兼葭楼诗集》)将付梓,然其人已入沉疴中,遂囑马叙伦为之校阅)。

料理君家最痛怀,琴书乍散路人哀(黄节逝世前,囑马叙伦等处理后事,未几,黄节瞑目而去,然尸骨未寒,其小妾已与其子为家产大打出手,马叙伦等出面为之析产,黄节身后之物皆变卖殆尽)。纵教归骨依先垄,应自伤心入夜台。此后相期见面多(黄节患病时曾对马叙伦言“此后愿多见面”),那堪一夕罢春歌。兼葭人去楼空吃,南小街头不忍过。

1947年年底,马叙伦因夜梦亡友,又以诗挽之:

羨君长卧作完人,剩我流离伏海滨。拥被时时忘节候,腊梅花报渐回春。犹忆当年风雨楼,相将歌哭动神州(清末,黄节与刘师培、邓实、马叙伦等在上海福州路惠福里邓实的“风雨楼”编辑《国粹学报》)。

正利斧诛榛足,却见灵旗偃石头。篋中犹有旧黄图,万户千门汉故都。生前欲续《西京赋》,地下还修《黄史》无?

李白坟高似九华,漆灯长焰白杨嗟。天际故人来入梦,海南此夜战声哗(黄节之墓在广州白云山,时日军已侵入广州)。

(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、浙江大学教授)